

文章编号:1673-1751(2017)02-0079-08

德·索绪尔的语言演变理论

王红生^{1,2}

(1.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2.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宝鸡 721013)

摘要:德·索绪尔的语言演变理论是他的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索绪尔的语言演变观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从语言本质出发,语言变化被赋予一种新理念,即语言的变化是关系或价值的变化;其二,语言的共时态和历时态虽有本质区别,但前者是研究后者的基础;其三,单位问题在研究语言的历时态中有重要地位,这是解决语言演变的关键。

关键词:德·索绪尔;共时态;历时态;价值;单位;演变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语言演变是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者、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如何认识语言演变?这是需认真研究的问题。笔者试图摒除加给索绪尔的不合理评价,对这位伟大语言学家的语变思想做以初步探讨,以期还原其理论精神的真正面貌。

1 语言的两种时间态

跟一般语言学家一样,索绪尔也重视从别的学科汲取营养以丰富语言学思想,只是他在这方面显得更为谨慎。索氏更关心研究跟语言这个对象有实质相似的对象科学,他认为这些学科的进展会助益语言科学的发展。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下文简称《教程》)中,我们看到索绪尔尤其重视经济学对语言学的重要作用 and 启示,他认为经济学和语言学有诸多相似处,它们都是研究价值的学问。有关索绪尔从经济学的视野对语言问题的论述可见拙文的解释说明^[1]。时间在这两个学科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索绪尔从时间角度将语言分为两种状态:一是共时态,即语言在特定时期的状态,这是相对静止的状态;一是历时态,即语言从前一时期演变到后一时期的运动状态。在索绪尔看来,这两种状态的实质区别主要有几方面:第一,语言共时态是社会的或集体的,而语言历时态则源于个人创新;第二,语言共时态的存

在地是特定社群心理,而历时态则依赖个人的物质言语;第三,语言共时态是系统的,而语言历时态事实则是个别的;第四,语言共时态处在特定时间,而历时态发生在不同时间之间。这两种状态的时间位置关系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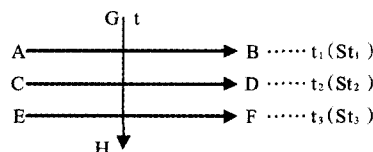


图 1 语言共时和历时两种状态

图 1 中 A—B、C—D、E—F 是“同时轴线”,表示 t_1 、 t_2 、 t_3 等不同时期语言存在的若干共时态 St_1 、 St_2 、 St_3 等;G—H 是“连续轴线”,表示语言在时间 t 的流动中的演变,即语言前一时期的共时态向后一时期共时态的连续演变,如 $St_1 \rightarrow St_2 \rightarrow St_3$ 等,这是语言的历时态。这样规定的“历时”和 19 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历史”很不相同。比较语言学使用的“历史”一词本来就模糊、含混,它本身就包括不同时代的状态,也包括状态之间的演变,如政治史是包括了各个时代政治状态的发展史。语言学使用“历史”这个词,会使人想到这种语言学是包含了各个时期语言状态的发展史,这就混淆了共时态和历时态这两种有实质区别的语言状态的界限。这两种状态对应两种不同语言学,即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前者“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后者“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

收稿日期:2016-03-28

作者简介:王红生(1979-),男,陕西大荔人,讲师,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比较语言学。

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2]。语言变化是历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徐思益从哲学矛盾运动律、语言理论方法等方面对索绪尔共时、历时的区分做过较为深入论述。^[3]笔者以为,索绪尔语言学是个完整体系,他的各种理论观点有机联系,要正确理解索氏对语言历时或语言变化的观点,必须联系索绪尔其他的一些重要观点。

首先,要正确理解语言共时和历时的联系。语言共时态中,各种语言成分依据一定关系而组成一个系统,研究这个状态便是研究这个系统。这是《教程》论述着力之处,至今还有人极端地认为索绪尔只研究静止状态的语言,而忽视对语言变化的研究。这种意见不值一驳。不过,与语言历时研究相较,索绪尔更看重语言共时研究,这却是事实。按索绪尔的看法,不搞清楚语言共时态,也不能真正认识语言历时态,这两种语言状态密切相关。有人认为索绪尔割裂了共时和历时的关系,制造了它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比如,雅柯布森批评索绪尔“试图割断语言系统与自身变化的联系”^[4]。我国也有些学者发表过类似看法,如李葆嘉认为,索绪尔“以极端方式隔断了历时和共时的关系,把共时放在绝对优先的位置”^[5]。

共时态(动言系统) ←——言语——→ 历时态(动言变化)

图2 沟通两种语言状态的言语

由图2可见:一方面,言语是语言的实现形式,我们靠言语建立若干语言共时态系统;另一方面,语言变化来自言语,我们靠言语探求语言从一个共时态到另一个共时态的变化。《教程》指出:“语言中凡属历时的,都只是由于言语”。^[2]这说明,历时态中的一个状态不会直接过渡到另一状态,引起它演变的是言语。可将图1中各种共时态的演变转换一下,结果见图3。

$St_1 \rightarrow \dots (\text{言语}) \dots \rightarrow St_2 \rightarrow \dots (\text{言语})$
 $\dots \rightarrow St_3 \rightarrow \dots (\text{言语}) \dots$

图3 言语在历时演变中的地位

言语沟通语言两种时间态的作用可见文献^[7],这里不赘述。索绪尔认为,语言历时演变与系统无关,发生在系统之外。这句话常被人误解。其实,索

徐通锵指出:“语言系统的同质说只着眼于语言的共时状态,绝对排除历时的干扰”,“但是,语言系统如何从这一共时状态过渡到那一共时状态,我们从语言系统同质说的语言共时状态中找不到任何过渡的机制和原因。这样,语言只能是一种僵化的死系统,而缺乏交际中运转着的语言的活生生的具体内容”,“青年语法学派研究语言的历时变化,而结构语言学派则集中研究语言的共时结构。在他们各自的研究中,共时和历时是脱节的,人们弄不清楚语言的这一共时结构变到那一共时结构的机制、过程 and 原因,不知道语言是怎么起变(actuation)的。”^[6]这些对索绪尔语言学的评价并不客观,未能从整体上把握索氏的语言学思想。其实,语言这两种时间态根本不存在所谓“鸿沟”,而沟通它们的是言语。

这便涉及索绪尔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则,即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和联系。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及联系贯穿索氏语言研究的始终。语言是集体的、一般的、抽象的、心理的、同质的、系统的、有限的等;言语则是个人的、个别的、具体的、实体的、异质的、非系统的、无限的等。言语将共时和历时这两种时间态沟通起来,见图2。

氏只是告诉我们,语言变化源于人对语言的使用,变化因为言语,对于使用同一种语言的社群来说,言语当然在系统之外,这并非否定系统在历时研究中的地位,变化的结果总要顾及对系统的影响。

言语在语言变化中的重要作用,难以掩盖语言两种时间态的实质区别。为语言研究的深入和对语言现象做出有效解释,有人主张促成共时和历时研究的“分久必合”。比如,沈家煊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等“把语言看作一个自足的系统,然而,语法化现象却表明语言并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它跟语言外的因素,如人的认知能力密不可分”,“结构主义语言学从索绪尔开始严格区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但实际上有许多现象离开了历时因素就解释不清”,因此“历时和共时不是语言本身的两个平面,而是语言研究的两个平面。在研究中把共时和

历时截然区分开来已不利于共时研究的深入,因为当今的共时研究不再满足于对语言事实的描写,还要对语言事实做出解释,这就必须考虑历时因素。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的分家已为期过长,分久必合,现在是把两者重新结合起来的时候了”。^[8]笔者认为,语法化与语言外的因素(如人的认知能力)有关,但与语言是否为自足系统似乎无关。作为历时演变现象,语法化跟其他变化一样,都与言语有关,而言语是异质的,它是跨心智、逻辑、生理、物理、语境、情感、文化等不同领域的混合物,自然也包含认知因素。言语研究的复杂性,以致布龙菲尔德说它“相当于人类知识的总和了”^[9]。区分共时、历时实有必要,索绪尔曾提醒学者“要把这两方面杂糅在一起进行概括是荒谬的。而语言学自诞生以来却一直想将这种荒谬主张强加给理性”^[10]。没有实质不同的共时态和历时态,哪来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呢?

2 共时研究是历时研究的基础

语言共时研究是历时研究的基础,没有对共时的深入研究,也不会知道语言变化的条件、如何演变以及到底变了什么。共时和历时紧密联系,这是索绪尔理论整体性的表现。例如在图1中,要研究 $St_1 \rightarrow St_2$,假如不了解 St_1 ,也不会知道其蕴涵的变化条件,而不了解 St_1 、 St_2 两种共时态的性质及状况,也不会知道语言变化的机制及变化的程度。因此,要解决语言变化问题,先要对共时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

语言的共时态表现为在特定时期的系统性,而系统则是语言各种成分通过关系组成的整体。索绪尔认为,语言的本质是关系,即“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为此,索氏提出句段、联想两种关系。他认为:前者是“以语言的线条特征为基础”“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现场”的关系;后者是“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语言成分“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所在地是在人们的脑子里”“不在现场”的关系。另外,这两大关系也有连带关联,他说“事实上,空间上的配合可以帮助联想配合的建立,而联想配合又是分析句段各部分所必须的”,每个组合都“有两个联想系列作为它的支柱”^[2]。只有依

据这种连带关系才能认识语言系统。有关索绪尔对语言本质、句段关系、联想关系及其联系的详细说明,可见文献[11]的论述。语言这种本质决定了语言其他问题由它决定和规定。

共时态的另一个问题是语言单位问题,这是语言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完全以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2]。索绪尔剖析语言单位的理论依据是他的语言价值学说。索氏认为,一切价值都由两方面组成:一种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交换的不同的物;一些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相比的类似的物。他说:“要使一个价值能够存在,必须有这两个因素。”语言学与经济学的情况相似,比如:“一个词可以跟某种不同的东西即观念交换;也可以跟某种同性质的东西即另一个词相比。因此,我们只看到词能跟某个概念‘交换’,即看到它具有某种意义,还不能确定它的价值;我们还必须把它跟类似的价值,跟其他可能与之相对立的词比较。我们要借助于在它之外的东西才能真正确定它的内容。词既然是系统的一部分,就不仅具有一个意义,而且特别是具有一个价值;这完全是另一回事。”^[2]语言学中所谓“不同的物”是指如符号内音、义的交换关系,所谓“类似的物”是指如音与音、义与义、符号与符号等的交换关系。语言的价值是由其关系本质规定的,“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任何要素的价值都是由围绕着它的要素决定的”。索绪尔同时指出,价值不仅能用于像“词”这样的单位,而且“也可以应用于语言的任何要素”^[2]。有关详细探讨索绪尔价值学说的文献,可见索振羽^[12]、徐思益^[3]等人的论述。

不同于一般人的想象,语言单位并不是预知的,而要靠一套发现程序得出。笔者曾根据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和联系,以及索绪尔的语言价值理论,将语言学的单位分为语言单位和言语单位,而且认为语言单位由关系或价值决定,是以关系与价值为标尺从呈现为物质实体的言语单位抽象概括出来的。即凡关系、价值具有同一性的不同言语单位归为一个语言单位,凡关系、价值上对立的不同言语单位则区别为不同的语言单位^[13]。索

绪尔指出:“语言机构整个是在同一性和差别性上打转的”^[2]。不同言语单位,物质上体现为“差别性”,而每个语言单位包含的言语单位在关系或价值上表现为“同一性”。索氏用打比方的方式说明这个道理:“例如两班‘晚上八时四十五分的日内瓦—巴黎’快车相隔二十四小时开出,我们说这两班快车有同一性。在我们的眼里,这是同一班快车,但很可能这两班车的车头、车厢、人员,全都不一样。或者一条街道被拆毁后重新建筑起来,我们说这是同一条街道,但是在物质上,那旧的街道可能已经荡然无存。一条街道为什么能够从头到尾重新建筑而仍不失为同一条街道呢?因为它所构成的实体并不纯粹是物质上的。它以某些条件为基础,而这些条件,例如它与其他街道的相对位置,却是跟它的偶然的材料毫不相干的。同样,构成快车的是它的开车时间、路程和使它区别于其他快车的种种情况。每次这些相同的条件得以实现,我们就得到相同的实体。然而实体不是抽象的,街道或快车离开了物质的实现都无从想象”,“再拿下棋来比较,就可以使我们明白这一点。比方一枚卒子,本身是不是下棋的要素呢?当然不是。因为只凭它的纯物质性,离开了它在棋盘上的位置和其他的下棋条件,它对下棋的人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当它披上自己的价值,并与这价值结为一体,才成为现实和具体的要素。假如在下棋的时候,这个棋子弄坏了或者丢失了,我们可不可以用另一个等价的来代替它呢?当然可以。不但可以换上另外一枚棋子,甚至可以换上一个外形完全不同的棋子。只要我们授以相同的价值,照样可以宣布它是同一个东西。由此可见,在像语言这样的符号系统中,各个要素是按照一定的规则互相保持平衡的,同一性的概念常与价值的概念融合在一起,反过来也是一样。”^[2]语言关系、价值划分的语言学单位是由语言内部依据而定的,而不是依赖外部(如逻辑、生理、物理等)的依据。

数学的集合概念很能说明这种关系,即共时态每个语言单位相当一个由诸多有同一性的不同言语单位构成的集合或种类(set),可把这些不同言语单位看作这个集合的不同元素(member)。每个语言单位包含的不同言语单位凭关系、价值的作用聚集

在一起,它们构成既差别又同一的关系。说有差别是基于言语本身性质说的,说有同一性是就关系、价值的同一性说的。如果用大写字母A、B等表示不同语言单位,用小写字母a、b等分别表示A、B等单位包含的言语单位,这种关系可示为: $A = \{a_1, a_2, a_3, \dots\}$, $B = \{b_1, b_2, b_3, \dots\}$,等等。每个语言单位,例如A包含的不同言语单位 a_1, a_2, a_3 等是有差别的,即 $a_1 \neq a_2 \neq a_3 \neq \dots$,但这些言语单位又有价值的同一性,即 $a_1 = a_2 = a_3 = \dots$ 。语言单位包含的言语单位的差别性可能是物质的,如汉语普通话语气词“啊”,随其前面音节的收尾音不同而有不同的读音:打啊:-a+a→a或ia;来啊:-i+a→ia;好啊-u+a→ua;看啊-n+a→na;唱啊ng+a→nga^[14]。这些不同的读法属语言单位“啊”这个集合的不同言语单位,即 $啊 = \{a, ia, ua, na, nga\}$ 。“啊”这些言语单位虽存有差别,即 $a \neq ia \neq ua \neq na \neq nga$,但它们又有价值的同一性,即 $a = ia = ua = na = nga$ 。有些言语单位的差别是语言单位实现在不同言语链条上的个别关系的差别,如汉语语法研究中曾流行的一种所谓“名物化”说认为,汉语动词、形容词做主语、宾语时词性发生了改变,“当名词用”“名物化”“名词化”了。这种学说并不科学,其症结在于只看到一个动词或形容词在不同句法位置的差别性,却没看到它们的同一性。朱德熙反对“名物化”说,并提出“概括词”和“个体词”两种不同语法词语,并论证了这两种词的辩证统一关系^[15]。我们曾指出,朱德熙的“概括词”属语言单位,“个体词”属言语单位,而每个“概括词”包含诸多“个体词”,这些“个体词”的差别来自个别关系的差别,但它们的价值又具有同一性^[13]。

语言单位A、B等是由不同言语单位组成的集合,这决定了这种集合可能有交集,即包含相同的言语单位。假如 $a_1 = b_1, a_2 = b_2$ 等,A、B的交集可示为: $A \cap B = \{a_1 \text{ 或 } b_1, a_2 \text{ 或 } b_2 \text{ 等}\}$ 。当然,虽然语言单位A、B可能有共同元素,但 $A \neq B$,因为它们是包含不同元素的集合概念。例如,汉语普通话两个上声字连读,第一个上声字要读阳平,有人把这种现象释为“音位对立的中和”,甚至将此看作“语音的突然变化”^[6]。笔者认为,音位是语言单位,是集合概念,不是言语单位,所谓“中和”只是说阳平、上声这两种调位或集合有共同的言语单位或元素,即上声调位 \cap 阳平调位 $= \{35$

调},这并不存在所谓“变化”,上声调并没变成阳平调。人们之所以得出“变化”这种结论,实际上混淆了语言单位和言语单位这两个不同概念。有关对语音单位问题的讨论可见笔者已有的论述^[16],这里不赘述。在方法上,要得出共时态的言语单位应讲究分析法,要得出语言单位则讲求归纳法,即将若干个言语单位归纳为一个语言单位,归纳的标尺就是价值的同一性。

以上论述了“完全以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这个语言共时态,这个时间态中每个单位都与别的单位发生关系,关系是每个单位的存在方式并决定它的价值。简言之,语言共时态是个价值系统。语言历时态是从一个共时态到另一个共时态(如 $St_1 \rightarrow St_2$) 的演变,不对每个共时态做充分了解便不能对语变有深入研究,这也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何将共时态作为语言研究核心和基础的原因。

3 语言的历时演变

19 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以语变研究为中心,但雅柯布森却批评它“严格讲表现得缺乏历史意识”^[4]。语言学者的语言观不同,对语言“变化”含义的理解也不一样。索绪尔早先也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但最终决心走出一条新路。他认为,语言共时态是价值系统,这种语言观注定会给语言变化注入新精神。

这里先列出徐通锵对索绪尔及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演变观的一段议论,这些讨论已触及语变研究的一些根本问题,笔者以此为基础谈一些我们对索绪尔语言历时演变基本理论的理解。徐通锵说:“结构语言学在语言研究中首先确定语言中的单位。音位(phoneme)和语素(morpheme)是语言系统中的两个最基本的单位。-eme(phoneme, morpheme, lexeme, tagmeme, theme...)是语言学家运用结构分析法找出来的各级语言单位。语言的分析由于以‘位’(-eme)为单位,因而首先需要根据分布的原则把各种 allo- (‘素’,如 allophone, allomorph...) 归纳为 -eme (‘位’)。这种共时分析的原则运用于语言史的研究就表现为结构语言学对音变的一些特殊的理解,认为音变必须以音位为单位,只有音位之间的关系发生了

变化,即影响音系的变化才能认为是音变。雅科布逊把‘每一种变化(modification)都必须看成它所属的那个系统的一种功能’称为历史音系学(historical phonology)的第一条原则,认为‘只有能够说明它在语言系统中的作用才能看成音系的变化(phonological change)’。这种看法比起德·索绪尔的理论来已经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德·索绪尔认为‘变化永远不会涉及整个系统,而只涉及它的这个或那个要素,只能在系统之外进行研究。毫无疑问,每个变化都会在系统内有反响,但是原始事实却只能影响一点;原始事实和它对整个系统可能产生的后果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在这方面,雅科布逊是对的,不能认为变化与系统无关。从‘只能在系统之外进行研究’到‘每一种变化都必须看成为它所属的那个系统的一种功能’,这是语言史研究的方法论的一次重大的突破。”^[6]徐通锵这里主要说的是语音变化。据笔者看,徐通锵对索绪尔语言学的这些看法,有的符合事实,有的可能需商榷。下面根据我们对索绪尔语言学的研究详论两处。

第一,将语言变化跟系统或关系联系起来,这种语变观是索绪尔及结构主义语言学基于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提出的,这是对传统语言学语言变化观念的彻底革新。传统语言学认为,语音变化是“发音习惯的变化”,而布龙菲尔德认为“语音演变只在引起音位模式的变化才会获得意义”^[9]。所谓“音位模式的变化”实质是语音结构关系的演变。本文第一部分已指出,索绪尔认为语言演变与系统无关,只是想说语言演变是因为言语变化,言语当然在系统之外,而演变结果自然会对系统有所影响。据我们对雅科布逊相关论文的分析^[4],雅氏所谓“必须从语言系统的角度研究语言变化”主要是对“功能方言”说的,是对系统中具有不同文体价值的成分的关注。笔者认为,语言系统中存在不同的文体成分,它们有自己的价值,一个文体成分代替另一个成分,离不开人对语言使用的变化,这仍然是言语在起作用。另外,索绪尔所谈的语言变化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连续性变化,一是创造性变化,而雅氏所说的共存的、有文体价值的成分的代替关系只属后者。这两种变化都是由言语变化引起的。语言创新总先在个人

言语中出现,当这种创新为社群普遍接受便成为语言事实,从而完成一个共时态到另一个共时态的演变(如 $St_1 \rightarrow St_2$),演变结果会导致系统或关系的转变。

第二,单位是历时演变研究的中心问题。以语音历时演变说,索绪尔的看法似乎并非像徐通锵评价的那样。比如,索绪尔谈到跟条件相关的语音变化时说:“发生变化的不是音种,而是在某些……条件下出现的音位。”^[2]索氏所说的“音种”类似今天语音学的“音位”,而所说的“音位”相当今天所说的“音素”。用本文区分的两种语言学单位表达现在常用的语音学术语,音位是语言单位,音素是言语单位。据索绪尔的论述,言语单位在语言历时研究中有重要地位,历时演变绝非仅靠音位这种抽象单位。语言历时态中的单位问题,仍然围绕语言单位和言语单位这两种单位的区分及辩证统一关系展开,单位的历时演变无非是从前期共时态的语言单位及其包含的言语单位到后期共时态重新抽象为新单位的过程。可以图1中 $St_1 \rightarrow St_2$ 为例,简单讨论语言演变的基本步骤。

①假如语言 t_1 时代的共时态 St_1 有语言单位 At_1 、 Bt_1 等,这些语言单位各包含不同言语单位,如 $At_1 = \{a_1, a_2, a_3, \dots\}$, $Bt_1 = \{b_1, b_2, b_3, \dots\}$, 等等。根据本文论及的语言学中这两种单位的区分及辩证统一关系,在这个共时态中,每个语言单位包含的若干言语单位既有差别性,又有关系、价值的同一性。各言语单位靠心理作用联系在一起,对于使用这种语言的社群来说,每个语言单位包含的有差别的言语单位被视作相同的东西。对历时演变说,言语单位的差别性居于特殊地位,即 St_1 每个语言单位包含的言语单位的差别性为语言变化创造了条件,具体说就是这种差别性是语言演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即有差别并不意味着一定演变,而变化却是由这种差别触发的。这说明,语言共时态中已经孕育着变化因素,只不过这种因素在言语层面却不在语言层面。

②在 $t_1 \rightarrow t_2$ 时间序列中, St_1 的语言单位如 At_1 、 Bt_1 等包含的有差别的言语单位分别使用、各自行动。言语单位的特征是出现在不同的言语链条中,它们的差别性是由言语的个别性造成的。语言是随着人对语言的使用发生变化的,而言语

是人交际的基本单位。对一个语言单位来说,人们使用它交际时,每次只用属于它的一个言语单位,这个言语单位出现在个别言语链条中。 t_1 时期每个语言单位包含的言语单位以关系或价值的同一性联结在一起,并作为这个时期社群集体心理的共同部分;到 t_2 时期,这种语言同一性的社群心理可能发生了变化,即 t_2 时期的社群心理可能会认为 t_1 时期有的语言单位包含的言语单位不是有差别而是对立的。笔者认为言语单位的区别和语言单位的区别不是一回事,语言学应采用不同的名称表示它们,本文暂用“差别”表示言语单位的区别,而用“对立”表示语言单位的区别。 $St_1 \rightarrow St_2$ 中,对 St_1 语言单位包含的言语单位的重新分析导致的心理变化是语变的充分条件,即当把 St_1 具有同一性的言语单位不再认作同一性的东西时,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便会采取一定的手段将它们加以区别而引起语变。其实,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本应是心理学的分支,人们常据此认为索绪尔是“唯心主义”者,这是很大的误解。笔者曾对索绪尔语言学的心理学观点做过辨析^[17],认为心理变化在语言演变中应占有重要地位。

③根据以上所论的语变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St_1 \rightarrow St_2$ 的演变,实为 St_1 语言单位包含的不同言语单位到 St_2 以分裂、重组的方式抽象为新语言单位的过程。这里以 t_1 时期 St_1 的语言单位 At_1 、 Bt_1 的演变为例简单说明这个道理。 St_1 的语言单位 At_1 、 Bt_1 各自包含若干言语单位,即 $At_1 = \{a_1, a_2, a_3, \dots\}$, $Bt_1 = \{b_1, b_2, b_3, \dots\}$, 在 $t_1 \rightarrow t_2$ 时间序列中, t_1 时期 At_1 、 Bt_1 包含的若干言语单位到 t_2 时期以分裂、重组的方式抽象为新语言单位 At_2 、 Bt_2 等。这种演变过程,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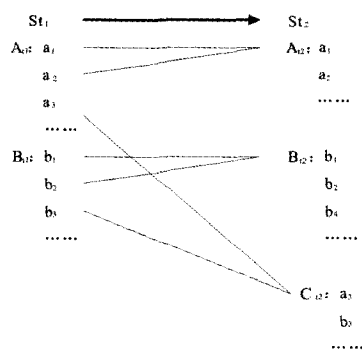


图4 语言历时单位演变示意

图4只是个简易图,用来大致说明单位历时演变的轮廓。这个简易图中, t_1 时期的语言单位 At_1 包含的言语单位 a_1 、 a_2 等,到 t_2 时期重组抽象为语言单位 At_2 ; Bt_1 包含的言语单位 b_1 、 b_2 等,到 t_2 时期重组抽象为语言单位 Bt_2 ;而 At_1 包含的言语单位 a_3 等, Bt_1 包含的言语单位 b_3 等,到 t_2 时期重组抽象为语言单位 Ct_2 ,等。 t_2 时期的新单位就是这样一个个产生的,这些新单位通过关系结成 St_2 。与 St_1 同理, St_2 的每个语言单位包含的言语单位也以关系或价值的同一性联结在一起,并成为这个时期社群集体心理的共同部分。

以汉语音韵学一个音变的例子进一步说明这种历时演变。例如,中古汉语“精”组和“见”组声母,后来演变为 ts 、 ts^h 、 s ; k 、 k^h 、 x 两组声母,这两组声母受韵母影响,发展到现代汉语又分化为新的两组声母,其中在齐齿呼、撮口呼前变成 $tʃ$ 、 $tʃ^h$ 、 $ʃ$,而在开口呼、合口呼前变为 ts 、 ts^h 、 s ; k 、 k^h 、 x 。以本文观点分析这种音变现象,演变前 ts 组、 k 组两组声母受后面韵母影响在实际言语中已存在差别,在齐齿呼、撮口呼前读为 $[tʃ]$ 、 $[tʃ^h]$ 、 $[ʃ]$,在开口呼、合口呼前读为 $[ts]$ 、 $[ts^h]$ 、 $[s]$; $[k]$ 、 $[k^h]$ 、 $[x]$ 。这样, ts 组、 k 组这些声母的语言单位本就包含了不同的言语单位,比如, $ts = \{[ts]$ 、 $[tʃ]\}$, $k = \{[k]$ 、 $[kʰ]\}$,等等。 ts 包含的言语单位 $[ts]$ 、 $[tʃ]$ 声感上虽有差别,但它们具有价值同一性。其他声母以此类推。同时,这一时期,这些语言单位也有交集,如 $ts \cap k = \{[tʃ]\}$,余者类推。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演变中,这两组声母包含的言语单位以分裂、重组的方式抽象为新语言单位,前期 ts 组、 k 组声母在开口呼、合口呼前读为 $[ts]$ 、 $[ts^h]$ 、 $[s]$; $[k]$ 、 $[k^h]$ 、 $[x]$ 的言语单位抽象为 ts 、 ts^h 、 s ; k 、 k^h 、 x 等语言单位,而在齐齿呼、撮口呼前读如 $[tʃ]$ 、 $[tʃ^h]$ 、 $[ʃ]$ 的言语单位抽象为 $tʃ$ 、 $tʃ^h$ 、 $ʃ$ 等语言单位。

综上所述,语言的共时态和历时态虽是本质不同的两个时间态,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没有对语言共时态的研究也没法深入研究语言的历时演变。单位问题是语言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在语言共时态和历时态这两种状态中有复杂表现。而对语言单位的演变来说,一言以蔽之,其实质是关系或价值的转变。比如语音演变,决非声音物质

性的变化,而是语音关系或价值的变化。词汇、语法的演变也是如此。客观地讲,就语言学而言,目前人们对语言共时态的研究已较为充分,但对语言历时态或语变的研究还不成熟,索绪尔的语变思想能为我们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有利于解决当前遇到的诸多复杂的语变问题。本文仅对这位现代语言学创始人的语言演变理论做了初步讨论,实际上索绪尔的语变思想非常丰富深刻,有待将来进一步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 [1] 王红生. 经济学视野之下的语言学[J]. 河南理工大学(社科版), 2015(4): 462-467.
- [2]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3] 徐思益. 语言研究探索[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4] 雅柯布森. 雅柯布森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5] 李葆嘉. 语言学大师之谜和心理索绪尔[M]//赵曹晖. 索绪尔研究在中国.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6] 徐通锵. 历史语言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7] 王红生, 施向东. 评几种质疑共时和历时划分的语言学观点[J]. 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6): 148-153.
- [8] 沈家煊. “语法化”研究综观[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4): 22-23.
- [9] 布龙菲尔德. 语言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10] 信德麟.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评介[J]. 国外语言学, 1993(4): 11.
- [11] 王红生. 论语言的本质[J]. 南华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5(3): 90-95.
- [12] 索振羽. 德·索绪尔的语言价值理论[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2): 123-129.
- [13] 王红生. 汉语语法分析的两种单位——从汉语动词、形容词“名物化”说起[J]. 殷都学刊, 2015(3): 95-99.

- [14] 朱德熙. 朱德熙选集[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15] 朱德熙. 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J].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 1961(4): 51-64.
- [16] 王红生. 索绪尔的语音价值理论初探[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16(6): 53-54.
- [17] 王红生. 正确理解语言的社会心理属性[J]. 武陵学刊, 2015(6): 109-114.

DE SONOL'S THEORY OF LANGUAGE EVOLUTION

WANG Hongsheng^{1,2}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 Sciences, Baoji 721013, China)

Abstract: De Sonol's theory of language evolu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theoretical system. There are three main features of his view of language evolution: based on the nature of language, language change is endowed with a new concept, that is, the change of language is the change of relation or value; although there is an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language, the former is the basis for the study of the latter; the problem of un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which is the key to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Key Words: De Sonol; synchronic; diachronic; value; unit; evolution